

# 第二國際巴黎大會之研究

段家鋒

(作者爲本校東亞研究所兼任教授)

## 摘要

第一國際巴黎大會，舉行於一九〇〇年九月，是第二國際各次大會中比較重要的一次。大會的討論重點，表面上是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之爭，和米勒蘭入閣是否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問題，實際上則是柏恩斯坦修正主義於九十年代末葉正式形成之後，所引發學者對許多實質問題的新穎看法。

柏恩斯坦修正主義，是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德國版。雖然柏恩斯坦學說受馬克思、恩格斯資本主義演進學說、拉薩爾民主社會學說，以及杜林的幻想影響均多，但是費邊社思想才是它的正宗。受他批判馬克思「工人無祖國」影響，大會上有若干聲浪和他唱和：「工人沒有什麼，只有祖國！」或者：「正因爲工人沒有祖國，我們才要給他造一個。」

## （一）柏恩斯坦修正主義已成氣候

1. 巴黎大會與修正主義•第一國際巴黎大會，舉行於一九〇〇年九月下旬，那是第二國際的第五次大會。表面上看，會議主題圍繞着兩個大問題爭論不休•反戰爭案與米勒蘭（Millerand）入閣案。其實只是一個問題的不同說法•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之爭。柯爾（G. D. H. Cole）認爲，這次大會表現在三方面：一爲米勒蘭入閣案的風波；二爲要不要設立「國際社會主義局」（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三爲尖銳問題爭執（acute dissension）即修正主義問題之處理。概括言之，

也都是修正主義問題。他認為大會前修正主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已經熱烈展開，但還沒有在國際間正式成為公開問題。巴黎大會以後，這問題才成為國際間爭論焦點。（註1）

柏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被稱為修正主義之父，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是掀起問題的主角。二十世紀以後，修正主義（Revisionism）這個名詞，幾乎和社會主義（Socialism）一樣響亮，這次大會到一次大戰前，成為一大潮流。列寧獲得政權後，修正主義者被斥為異端、叛徒、變節分子、從理論到人身都成共產黨人任意污蔑的對象，其激烈與不容置辯程度，只有中世紀基督徒對付異教徒或無神論者，差可比擬。

柏恩斯坦之所以受人尊重，一方面是他的理論的鏗鏘有力，一方面是他態度的光明磊落。不論謾誇責難如何嚴重，他都一直坦承自己是修正主義者，同時絕不放棄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忠誠。他不譏諷謾罵，只是指出馬克思對歷史的、經濟的預言、錯誤無效，必須以科學實證方法，修正馬克思的武斷成見。他說科學的真諦，就是不斷自我修正錯誤，馬克思自詡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却不許修正惑疑，不可思議。他以後長時期沒有人敢像他那樣坦率勇敢，這和共產黨的殘酷鎮壓有關。其實列寧對馬克思的修正，遠大於柏恩斯坦。因為列寧相信共產主義之不可避免，由於戰爭之不可避免。共產黨之奪取政權，有賴於「革命戰爭」。這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最大修正派。（註1）

一八五〇年一月柏恩斯坦出生，正是「歐洲社會主義」（European socialism）衰落的起點。那時候「共產黨宣言」剛剛發表兩年。他生於猶太人家庭，父親是火車司機，無法接受正常的高深教育，一八六七年十六歲時，便去銀行當學徒（apprentice），自謀生活，那一年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一八七一年他加入德國社會主義者南派「愛森那赫派」（Eisenach Socialist），給該派機關報「將來報」（Die Zukunft）奔走出力頗多。一八七五年南北兩派在哥達（Gotha）開會合併為「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e party），他逐漸成為德國黨的理論權威，對俾斯麥政府批判頗多。

一八七八年俾斯麥頒佈了「反社會主義者法」（Anti Socialist Laws），他被迫流亡瑞士，在蘇黎世主編社會民主黨報「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向德國本土散佈，作為對「反社會主義者法」的一種反抗。一八八八年瑞士政府終於應德國當局要求，驅逐柏恩斯坦出境，他流亡倫敦。這使他有機會成為恩格斯的朋友和學生，也成為剛剛成立了五年的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的政黨者和支持者，直至一九〇〇年才返國。英倫流亡期間，塑造了他的修正主義者鼻祖的形象。恩格斯於一八九五年逝世後，柏恩斯坦才有一系列的修正主義文章，刊登在考茨基 (Karl Kautsky 1854—1938) 主編的「新時代」(Die Neue Zeit) 上，那是社會民主黨的官方期刊。一八九九年發表他的修正主義經典著作「演進的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自此引起無限爭論。(註11)

2. 影響柏恩斯坦思想的幾個來源：哥倫比亞大學皮特·根 (Peter Gay) 教授所寫的「民主社會主義左右難」(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一書，被譽為對柏恩斯坦評論最中肯的一本書(註四)。該書認為柏恩斯坦思想受以下四個來源影響頗多。

(1)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演進的法則 (The Laws of Capitalist Evolution)。「修正主義理論幾乎沒有一點不是參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寫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堅固基礎，在於人與歷史的哲學給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明。馬克思主義建立在現代工人上。」(註五)他承認這方面的重要性，但馬克思從階級鬥爭觀點上論社會經濟，柏恩斯坦則從社會演化上否定馬克思所預言的政治解決方法。(註六)

(2) 拉薩爾的民主社會 (The Democratic State) 思想・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 浪漫的、民主的、富於煽動力和組織力的短暫生涯，成為部份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追求的形象。儘管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九一年的愛爾弗特大會 (Erfurt Congress) 上，把拉薩爾的政綱剷除一空，(註七)拉薩爾視社會主義必須實行於民主社會的觀念，在德國却根深蒂固，無法拔除。拉薩爾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絕對無法實現於純粹之低層階級 (Lower class) 社會，而必須由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共同以民主方式推動。柏恩斯坦對此，深信不疑。但他並沒有參加過任何拉薩爾集團，一八九一年他受命編纂拉薩爾文獻，從文字上受到影響。(註八)

(3) 杜林的有限幻想 (A Passing Fancy)・杜林 (Eugen Duhring 1833—1921) 的作品依皮特·根的看法，以現代眼光衡量，內容粗淺，思緒紊亂，為什麼會引起馬克思、恩格斯那麼大的注意，使恩格斯於一八七七年一月至七八年七月以約四十萬字的長篇去反駁？因為他有許多支持者和批評馬克思。

杜林注重實證與理論的合一，主張「己所欲者，亦施於人」（*to value the desire of others as equal to one's own*），以建立人與人間善意關係（*relation of will to will*）。最重要而和馬克思理論相似處，是他的暴力論（*the force theory*）。他說歷史始於暴力，直到現在只是一部壓迫與奴役史。現在社會是強者壓迫弱者的結果。他和馬克思說法正好相反的一點，是說經濟依附於政治，在壓迫與被壓迫的政治鬥爭中，被壓迫者終將獲勝，建立一個自由、尊重個人、人與人間以善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體系」（*Socialitary System*）。柏恩斯坦引杜林的話以駁馬克思處頗多，但並不是說柏氏完全受杜林的影響或同意杜林的觀點。（註九）

杜林相信的政治經濟理論是所謂「資產階級自由的自然法（*natural laws*）」，相信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個人財產權觀念。他設計的「社會主義體系」，理論根據界於無政府主義與聖西門（Saint-Simon 1760—1825）之間。但他是個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者，他說德國的社會主義，是為了「對抗猶太式社會民主」（*to counteract Jewish Social Democracy*）。生為猶太裔的柏恩斯坦，觀點某部份與杜林相同，關係則無法親密。（註十）

(4) 費邊社漸進主義的方法（*The Method of Gradualism*），柏恩斯坦修正主義思想最主要的來源是英國費邊社會主義。「必須承認的一項事實是：英國費邊社和德國修正主義，即使不是孿生，也是同胞兄弟。因為兩者的教條來自同一個國家，柏恩斯坦的基本修正主義理論來自費邊社，應是不容置疑的常識。」（註十一）

一八九九年柏恩斯坦發表了修正主義者最重要的這本書：「演進的社會主義」，上距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於一八八九年發表的「費邊論文集」（*Fabian Essays*），正好十年。柏氏書的出版，考茨基給予頗多鼓勵，雖然觀點多不相同。

柏氏此書，共計四章。第一為對馬克思社會主義基本教條的評析，第二為論當代社會的經濟發展，第三為社會民主的可行性，第四結論，論述最後目的和歷史趨勢。

3. 柏恩斯坦的主要觀點：柏恩斯坦與恩格斯情感在師友之間，一八九五年恩格斯生前，柏氏對馬克思學說，甚少直接批判。一八九六年起陸續發表他的不同看法，一八九九年出版「演進的社會主義」，是他的總結。

首先從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分析馬克思自認是「科學社會主義」問題。他說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基礎，建立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上。其實那只是依經驗與邏輯，依情感與衝動，依願望與主觀意見，而不是科學。

他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意謂歷史必然的決定因素在物質。一切現象都本源於物質運動，物質運動則自始至終遵照唯物主義者學說（materialist doctrine），依機械的物質因素而獲致一定結果。大的物質環境決定了的，人的思想形式和意志方向，都無法避免改變。一切歷史事件，決定於物質的存在條件。（註111）這是盡人皆知的馬克思「存在決定意識」問題。

什麼是歷史事件不同關係的決定因素？馬克思歸因於生產方法（the method of Production）。這是所謂「唯物」的具體表徵，生產方法的物質因素，決定人類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程序，即所謂以經濟的下層基礎，決定法律、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因而，生產關係，財產關係，很快的會趕不上生產方法和生產力的發展，反而成為新的生產方法發展的「桎梏」——絆腳石，於是革命成為不可避免，上層建築會遲早隨着物質基礎的改變而崩潰。資產階級生產關係，是最後的人類敵對生產關係。

柏恩斯坦認為，馬克思如此不厭其煩的把意識（Consciousness）與存在（existence）兩個名詞予以尖銳對立，而且使意識居於存在之下，再三強調「不是人的意識決定存在方式，相反的是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他認為馬克思的此項結論，即人生活的唯一目的，不過是以歷史勢力代理人的身分（an living agents of historical powers），反對人類自己的知識和意志而已，豈不可嘆！柏恩斯坦說這其實只是馬克思修詞學上一種巧妙詭辯，故意抱物質革命和社會革命區分開來，使意識形態屈服於物質條件，把人變成替意識衝突鬥爭的打手，目的只是為無產階級革命找理論根據。無產階級專政，是封建專制「低級文化」的「隔代遺傳」。所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不是「歷史鐵律」（the iron necessity of history），歷史的鐵律其實是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註111）

馬克思把「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恩格斯說這一剩餘剝削的「經濟律」，已經有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歷史。柏恩斯坦認為，馬克思祖述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勞動價值說，那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初，資本累積、土地利用、生產方法均極簡陋情形下，靠體力勞動第一的一種觀念。剩餘價

值在奴隸時代和師徒制度中，十分明顯。因爲奴隸和學徒勞動成果，完全爲奴隸主和師傅所有。工業社會勞動價值究竟如何確定？馬克思說法極爲混淆。事實上亞當斯密所說勞動價值，指勞動者以勞力交換來之工價，是工業生產中價值的一部份。柏恩斯坦認爲，勞動價值應決定於市場購買能力與總生產之間關係，因而要從全體生產關係着眼。馬克思所說「平均熟練程度及勞動強度」，十分抽象。但說產品應屬於勞動者，用以強調剝削與被剝削關係，結果把社會觀念導入最錯誤方向。最後代價是產生少數待遇太高的「工人貴族」（aristocracy of labor），絕大多數工人則待遇奇低。因爲忽略了生產及市場購買力的雙方關係。（註一四）

最具有說服力的，是柏恩斯坦用英、德兩國二十年的統計數字，說明「現代社會財富分配」（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modern community）。他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明財產集中，中產階級被驅入無產階級行列的情形，對錯各半。對的部份，世界性利潤減低，生產過剩，定期經濟蕭條引起經濟危機，都是事實。錯的部份極其嚴重。由統計資料證明，人民收入逐年提高，生活改善，一方面資本家人數大量增加，他方面公司股票流入社會一般人民手中，使財富作了新的分配。依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British Review 統計，一八五一年英國中等收入的家庭約三十萬家，一八八一年爲九十九萬家，一八九七年則爲一五〇萬家。他的結論是：馬克思資產階級人數將越來越少的說法，絕對錯誤。將來的社會主義不是建立在少數富人和多數窮人對立的社會上，而是建立在多數富人共存共榮的社會上。

依以上分析，他認爲中產階級將以中小企業形式，繼續向三方面發表：

- (1) 大量的貿易公司興起，以應企業繁榮需要。
- (2) 生產者產品將力求適合消費者需要，兢兢業業，自謀生存，力求勞工階級的合作。所以勞工亦將收入增加，生活改善。
- (3) 大企業依賴中小企業爲下游工業或衛星工業，亦即大資本家依賴中小資本家支援。結果大小資本家不是集中併吞關係，而是互相依存關係。經營不善者倒閉，那是個別問題，不是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問題。（註一五）

至於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柏恩斯坦認爲，把人類強分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絕大多數人都無法說明他究竟屬於那一階級。馬克思有一點看的很對，即認爲資本主義時期與其他時代最大不同處，是廣大無產階級可以組成政黨，獲得政

權。無產階級獲得政權方式有二：一為以選票控制的議會鬥爭，一為以武力奪取的革命顛覆。柏恩斯坦分析馬克思、恩格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常以巴黎公社或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為藍圖，兩者兩人都會加以歌誦，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內對兩者稱讚尤多。結果是這些被稱讚的統治情況，都遠劣於專政以前的所謂「殘暴統治」。另一方面，恐怖時代的結束，就是專政統治的停止，專政竟完全建立在恐怖鎮壓上。（註一六）他說這不是人類期望的「社會主義」。

結論裏分析「最後目的與趨勢」（Ultimate aim and Tendency），重複他最著名的一句話：「社會主義的最後目的沒有什麼，運動就是一切」（the ultimate aim of socialism is nothing, but the movement is every thing）。承認了這一原則，不把傳統的「社會主義目的」看成神聖不可侵犯，反之把它看成可修正的，可批判的運動，這就是把原則建立在有根據確切事實上，而不是建立在從天空掉下來的獨斷教義上。他諷刺許多人只重教條，不重事實的作風，說這些人認為和教義相一致的才予以接受，和教義不一致的則不予接受，這種態度叫「詐欺或偽善」（Pettiforging or cant）。「康德反對 cant」（Kant against cant）——德國人反對這套虛假的把戲。（註一七）

他深信社會主義是必然趨勢，它的基礎建立在社會民主上。社會財富增加而非減少，不是由於所謂「資產階級和諧經濟家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bourgeois harmony economists），而是由於租稅詳估徵收的公平而成功（the boards of assessment for taxes）。有人說只重運動不重目的，可能失去社會主義的方向，他說社會民主就是最高目的。他舉英國為例，說英國的社會民主，一代代的由烏托邦思想演化而來。「如今不可能有任何社會主義者，夢想在英國以暴力革命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也不可能夢想用無產階級革命掌握英國議會。」（註一八）總結的最後幾句話是：

假如社會主義也有最後目的的話，它追求的最重要原則，表現在高度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上。高尚的道德操守，權利與義務均衡的守法觀念，都是文明進化到社會主義時期最具體的目標，此外看不出勞動階級有什麼理想值得追求實現的。

（註一九）

## 〔一〕 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之爭

這次大會強調的一個原則是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認為國際主義的理想，就是社會運動的實質。他倒認為一切工資階級的利益都是相同的，不論政治制度或語言生活有何不同，只要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社會中的勞動者，都有反抗資產階級特權的「自然需要」，因為他們具有「共同利益」。所以「國際主義的起點是工業社會，不論何處的無產階級勞動者，都要支持國際主義鬥爭的共同目標。」（註10）

國際主義的更深一層意義，是團結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沙文主義（Chauvinism）、愛國主義（Jingoism）與帝國主義（Imperialism）。當時國際社會上也高唱友愛和平，但社會主義者們認為，腔調雖然相同，其實同床異夢。「因為資產階級只唱國家主義的歌，無產階級則只為國際主義慶祝歡呼。」他們希望敵對國家間的無產階級，忘掉報復和仇恨，像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的詩描寫的那麼優美：「寬恕該死的敵人，忘掉花環和復仇」（Let wrath and vengeance forgot, and our deadly foe forgiven）。（註11）

這是巴黎大會上馬克思派或非馬克思派大致相同的想法，反對沙文主義，愛國主義，帝國主義，也就是反對戰爭，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殖民地主義。它的理論根據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所說的：「工人沒有祖國」，工人是天生的國際主義者。

這種說法在國際會議裏自然激起反對的聲浪，因為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葉，是民族主義和愛國思想最澎湃的時期。參加國際會議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反對戰爭的——至少口頭上沒有人敢主張戰爭。但並不等於說都為了「國際主義」而不愛自己的民族國家。

巴黎大會由法國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Francais）領袖饒勒斯（Jean Jaures 1859—1914）致開幕詞，愛國而長於演說的他，正當四十歲壯年，等於發表一篇動人的反戰宣言。

謹代表法國社會民主黨和各種組織的法國工人團體，向來自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兄弟們，致最熱烈的歡迎。全世界無產階級在意識上和行動上需要團結一致，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迫切過。因為資本主義者為了他們的長遠利益，正教唆沙文主義者在世界各地掀起種族偏見。鼓動新仇舊恨，用戰爭保障他們的既得地位。所以我們大會最重要的議程，

是用這個國際和平組織促進國際的兄弟友愛。（註 111）

饒勒斯是反戰、反沙文愛國主義最力的一個人，也是被列寧指罵為「社會沙文主義者」最嚴重的一個人。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大戰已起，他仍在巴黎演說，大聲疾呼「和平解決問題」，終於被狂熱青年維廉（Raoul Vilian）刺殺。他同意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却反對馬克思的工人無祖國說法。他的名句是：「工人一無所有，只有祖國」（The poor have nothing but their fatherland）。但他反戰幾乎失去理性，主張「寧可叛變，不要戰爭」（insurrection rather than war）。相信能以和平仲裁（Peace through arbitration）解決國際爭論，也近於迷信程度。（註 111）

英國工會代表寇然（Pete Curran），站在反對殖民地主義立場，反對英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戰爭，他說：

英國代表們代表着英國從工會到政治團體的各種不同組織，但擁護國際和平却是一致的。我們堅決否認所謂英國無產階級支持英國政府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謠言，相反的，我們盡一切力量團結起來，反對英國政府的帝國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尤其反對英國政府在南非的強盜掠奪行爲。（註 114）

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地問題，本來是二而一的，但在二十世紀初葉，反殖民地侵略戰爭的理論體系，尚未建立，巴黎大會是反殖民地戰爭理論的國際性表現。當時歐洲各國均已有大同小異的強迫義務兵服役制度，任何人成年時期都要有兩年兵役生活。社會主義者們對付這一問題的態度，各國頗為不同。德國社會民主黨自九十年代俾斯麥「反社會主義法」的廢除和在國內席次增加，便試圖從立法上着手，阻止軍事預算案的通過，廢除常備軍，改設國民兵制度。這想法引起政府的強烈反對，不但以各種手段設法對社會主義者加以懲處，而且加強對青年的軍事訓練。因為相信軍訓可以使青年終生對國家忠誠。威廉第二甚至在他諸多「粗野而欠檢點的演說中」（the rash and ill-judged speeches），呼籲青年們不惜以「大義滅親」方式，槍殺阻止自己兒子應徵入伍的父母，表示貫徹政令的決心。法國饒勒斯派則呼籲各國無條件廢除軍備，以「永久消滅戰爭的主要來源」。（註 115）

這些理論在自己國內不方便或沒有適當場所可供發表，在這次大會上則可以暢所欲言。波蘭代表盧森堡（Rosa Bung 1870—1919）在這次大會上發表她有名的「資本主義崩潰論」，那是對馬克思學說的修正，也是對柏恩斯坦的批駁。她強調資

本主義的最後崩潰是必然的，但不是由於經濟危機，而是由於資本主義變成帝國主義後的軍事衝突。馬克思把資本主義崩潰論建立在貧富懸殊和經濟危機引發的無產階級革命上，柏恩斯坦用資本主義的適應力和不斷修正，避免最後的崩潰。她舉德國和美國的發展，和英國侵略印度、中國為例。說這些國家都迅速成為資本主義的強大國家，「但看不出將因無產階級愈益貧窮擴大，資產階級愈益壟斷集中而引發階級革命的跡象。」相反地，這些由資本主義變成帝國主義的「偉大剝削國家」(the great exploiting states)，將會因爭執奪殖民地而掀起戰爭，導致毀滅，則成勢不可允。(註二六)

柏恩斯坦沒有對馬克思的「工人無祖國」論提出特別反駁，可能與他自己是猶太裔德國公民有關。「二等公民」的心態，不會培植熾熱的國家觀念。但國際上社會主義者陣營中發起愛國主義的理論，對馬克思「工人無祖國」說法加以直接間接駁斥的，則以巴黎大會為起點。

一八四八年初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發表，「工人無祖國」是重點理論之一，以後半個世紀這理論成為建立國際主義的中心思想。巴黎大會上提出的反戰爭、反殖民地議案，原來是要充實「工人無祖國」的理論根據。意外的這議案引起相反的看法，就是「工人有祖國」。從巴黎大會經過以後一九〇四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第六次)、一九〇七年的斯圖加特大會(第七次)，反戰案和「工人有祖國」，都成為大會爭論的焦點。馬克思、列寧派以為反戰爭就是反政府，就是主張「工人無祖國」。大多數却以為，反對戰爭主張和平，並不一定要反政府，政府也不都是好戰派。反戰爭和「工人有祖國」是相行不悖的。

主張「工人有祖國」論者以為，「工人無祖國」指的不是工人的心態，實係「仇恨一切」(hatred of all)的流亡者的反抗心態。提出「工人無祖國」這個口號的，馬克思和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都該算是始作俑者。比較兩個人類們的說法：

馬克思說：

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什麼他們要廢除祖國，廢除民族。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原來沒有的東西。既然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確立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不過這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個意思。(註二七)

巴枯寧說：

我們現在相信，從現代人的知識、人性、正義等觀點看，愛國主義是一種罪惡，因為它直接否定了人類的平等和團結。要實際解決世界性社會問題，唯一的一條有效途徑，是不是都該齊聲呐喊・廢除國境線？（註二八）

馬克思和巴枯寧都不是工人無產階級，六十年代後期且成爲理論上的勢不兩立者。但持有「工人無祖國」的心態却是相同的，這和兩人的流亡放逐生涯有絕對因果關係。在以上引語裏，馬克思把工人和共產黨人視爲同一主體，不管工人承不承認，一口肯定共產黨人就是工人，工人就是共產黨人，是馬克思最武斷而「不科學」的論點之一。巴枯寧則爲他所得的、天真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找根據。

二十世紀初期至一次大戰爆發，社會主義者特別從巴黎大會起發展出新的理論，認爲馬克思、巴枯寧的「工人無祖國」論，都是半個多世紀前四十、五十年代的產物。那時候工人只是「世界兒童」（a child of the world），不論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無法參與分享國家的「普通文明」（Common civilization）。工人的生活需要、物質消費，教育和知識提升，發展機會等等，一概與國家無關。國家不照顧私人生活，不論對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都是一樣。

於是，馬克思說「工人無祖國」，社會主義者則說：「假如真的如此，讓我們給他們一個吧。我們該盡一切可能，使無產階級同享現代文明的福祉，使他們自己認爲是祖國的一分子。」因爲社會主義者都深深相信：一切文明都根植於國家，只有通過國家的基礎，文明才能發展出最高度的光輝。（註二九）

儘管口頭上掀起「工人無祖國」、「工人有祖國」的爭論，反戰爭、反殖民地掠奪的呼聲，却是一致的，於是通過以下第一個決議案。

鑒於國際社會主義者一八八九年巴黎大會、一八九一年布魯塞爾大會，及一八九六年倫敦大會譴責軍國主義爲資本主義社會最危險的結果之一，因而要求廢除常備軍並以國際仲裁法庭解決爭端，人民對於戰爭與和平問題應保有最後決定權；鑒於上次大會迄今四年來所發生之世界大事，極確切的證明無產階級在國際和平和正常社會發展上所作的諸多貢獻，已經被軍國主義者特別是最 recent 的世界性政策所危害；復鑒於擴張侵略及殖民地掠奪，導致各帝國主義者間嫉妒與仇恨的

暫短鬆解（例如對中國的八國聯軍侵略），反而帶來長期大戰的鉅大威脅，在經濟、政治、道德上所將付出的高昂代價，都要無產階級犧牲承擔。

大會茲特聲明：

1. 各國勞工黨應盡一切力量，不斷的反對政府的軍國主義和殖民地擴張政策。
2. 聯合各地無產階級不斷的為和平鬥爭，以反擊資產階級政府不斷的製造戰爭。這就是說，要放棄若干不切實際的「國際團結」的表演，採取實際有效步驟，以堅決反對軍國主義。

大會特建議以下三具體措施，以實現上項目標：

- (1) 各地社會黨應教育新興一代全力反對軍國主義爪牙（tooth and nail）。
- (2) 國會內社會黨黨員，應經常投票反對任何陸海軍經費預算案及殖民地冒險案。
- (3) 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mmittee）的常設機構，應即成立，以推動反對軍國主義的聯合運動。此項運動應在各國同時或個別的經常舉行。（註三〇）

這一個反戰爭、反殖民地決議案，無異議全體通過。與會的代表們只知道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曾在這次會上引起爭論，却無法預見到兩者很快發展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體。隨着這個決議，附帶通過一個議案，即譴責一八九八年的「海牙和平會議」（Hague peace Conference）。因為那個會議是「以各國政府代表為構成基礎，公開主張實現帝國主義目標，由資本家和好戰剝削者共同侈言裁軍、仲裁、和戰爭人道法案，只是無恥謊言。」（註三一）

另一個與反戰案有關而未獲通過的議案，是「總罷工反戰案」（The general Strike against war）。法國代表勃賴德（Braind, A 1862—1932）誇大罷工的威力，說「總罷工不只是阻止戰爭的主要手段，而且是掌握生產機構，從事武力革命的起點」。德國代表列金（Legien 1861—1920）則根據德國工會罷工澈底失敗的慘痛經驗，全力反對，認為希圖以罷工去反對或阻止戰爭，不但毫無可能，而且不負責任。此一議案因為已屆會議終了，決定留待以後另行討論。（註三一）

### 三 修正主義與兩大案——德雷福冤獄案與米勒蘭入閣案（註三三）

一八九六年倫敦大會至一九〇〇年巴黎大會，四年間社會主義陣營中爭論最烈的兩件大事，是法國猶太裔上尉軍官德雷福（Alfred Dreyfus）冤獄案，和法國社會主義領袖米勒蘭（Alexander Millerand 1859—1943）入閣案。宣騰多時的這兩件大事，到巴黎大會時，德雷福本人因冤案獲得平反，原設計導演人伊斯特哈茲伯爵（Count Esterhazy）被迫逃亡英國，計畫執行人亨利上校則於一八九八年自殺，此案可說已經落幕。米勒蘭入閣案是生於一八九九年六月，巴黎大會時，正成爲「社會主義者應不應該進入資產階級內閣」的熱門話題。（註三四）

這兩案所以和修正主義者扯上關係，因爲修正主義者都是一反馬克思死硬派的看法，對兩案有截然不同的立場。德雷福上尉於一八九四年被法國參謀本部控爲德國間諜，交付軍法審判，被判終身監禁於非洲幾內亞外海之大西洋魔鬼島（Devil's Island）上，掀起全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激烈爭論。法國蓋得派站在馬克思派立場，認爲是資產階級內部的事，不必理會。傾向修正主義者則自始就獲知，這是反猶案中一件精密設計的冤獄，不但關係着公平正義（evenhanded justice），而且關係着社會主義前途。饒勒斯主張把它當成社會主義黨內部的大事去辦，終於揭露秘密，使全案大白於世人。這對十九世紀末葉社會黨的蓬勃發展，有極大助力。（註三五）

時序進入二十世紀，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已經成爲不但是德國的，而且是歐洲的社會民主黨領袖。考茨基對這兩大案都有極迅速而堅定的反應。對於法國饒勒斯的堅決介入德雷福案，考茨基大加讚揚。他說社會主義者最壞的態度，就是對於像德雷福案樣這種影響全國人心的大事，給予漠不關心的態度。他視德雷福案爲「歐洲最大反動運動」（the great reactionary movement of Europe），是軍國主義與破產自由主義的典型作風。對於米勒蘭入閣案，考茨基不是反對他入閣去擔任工商部長，而是基於兩個理由，予以譴責。一是該內閣不該延請加利菲特將軍（General Gallifet）出任戰爭部長，此人被稱爲是「屠殺巴黎公社居民的劊子手」（the murderer of the Communards），因爲他曾是平定巴黎公社暴亂的主要負責人。另一個理由，考茨基認爲入閣與否是戰術問題，不該和基本理論混爲一談。米勒蘭不是不該入閣，而是在那個時候，

戰術上根本沒有加入資產階級內閣的必要。（註三六）

考茨基是近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強人，也是奇人。他是生於奧國的捷克人，父母都是「戲劇人」（父爲劇院畫師兼伶人，母爲伶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死後，他成爲德國社會民主黨最重要人物。他長期主編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新時代週刊」（*Die Neue Zeit*）。（註三七）他是恩格斯遺囑執行人，馬克思「文化財產」（*Nachlass-literary estate*）整理人。依他的整理，馬克思有「資本論第四卷——剩餘價值史」的出版。他是「一八九一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綱——愛爾弗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的起草人，那幾乎是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共同綱領。他也是奧、匈兩國社會黨黨綱的助理擬定人。九十年代後期到第一次大戰前，他是社會主義理論爭執的仲裁人。

由於他的播傳整理，使馬克思學說由「一家之言」（an esoteric system）變成世界性政治運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壯大，他的理論闡揚，功勞至大。該黨於一八九〇年二月之德國國會選舉，獲一百四十萬票，成最大黨。一八九八年獲二百萬票，一九〇三年獲三百萬票，一九一二年獲四百萬票，在國會擁有議會二一〇個，佔總席位四分之一。但他不是德國公民，一再拒絕成爲德國公民，沒有任何官職，不作黨或國會領袖，參加國際會議，也從來不任主席。這一切都無損於他的理論權威地位，第二國際後期理論，都以他的馬首斯瞻。他的生活費用，大部份依靠「時代」主編薪金支應。（註三八）

巴黎大會期間最活躍的三個社會黨來自三個國家：德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三國的社會黨在國際巴黎大會前一年內，都在國內召開過黨代表大會，討論對修正主義——米勒蘭入閣案的態度問題。

德國一八九九年底舉行大會於漢諾威（Hanover Congress），反對修正主義最力的是老牌馬克思主義者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對米勒蘭入閣案仍持「不妥協」的看法。他說：「伊斯蘭教徒當給所堅定的時候，就是不可屈服動搖的時候。」他同意爲「戰術目的」暫時「與資產階級聯合」，但「階級鬥爭」的立場不變，「解放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自己」，以及「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等主張，永不改變。（註三九）他是領袖，決議照他的意見通過。

法國社會黨在蓋得（Jules Guesde 1845—1922）主持下，於一九〇〇年夏季舉行伊夫里大會（Ivry Congress）。對於德國黨漢諾威大會的決議，表示十分歡迎。但決議說：「仇恨資產階級的立場，永不改變，不過在特殊情形下因戰術需要而和

資產階級黨作暫時聯合，則被允許。」（註四〇）

意大利社會黨領袖爲屠拉蒂（Filippo Turati 1857—1932），他是「米蘭社會主義協會」（Milan Socialist League）創立人，以後變成「意大利社會黨」（Italian socialist Party）。九十年代中期，他率先推行與「自由資產階級黨——共和派、急進派」等合作政策，使他的黨在意大利一九〇〇年六月國會大選中，由一八九七年的六萬八千票（十五席），躍升至十七萬五千票（三十二席）。意大利黨是深深知道「修正、聯合、調和派」的好處的，所以趕快在巴黎大會召開前的兩星期，召開意大利黨代表大會，決定對米勒蘭入閣案加以支持。（註四一）

假如說「反戰爭、反軍備」是第一國際歷屆大會共有的問題，米勒蘭入閣案則是巴黎大會共有的問題。會前各國準備參加的社會黨派，對此問題都有預先準備委當的腹案。贊成米勒蘭入閣，就是贊成與「資產階級」黨派聯合，就是贊成修正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深深知道，修正主義是大勢所趨，口頭上可以不贊成其理論，實質上則必須順應趨勢。德國黨之所以在「反社會主義法案」鎮壓下，仍能生存發展，在該法於一八九〇年廢止後，黨立即壯大，得力於妥協調和的修正主義路線。假如仍執着於馬克思死硬教條「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德國社會民主黨必無政治前途。考茨基對於此一情勢，認識至爲清楚。

於是大會上提出討論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和「資產階級」合作，而是要不要參加「資產階級」政府，放棄原則，聽候差遣。著名的「考茨基案」（the resolution of kautsky），說基於戰術着眼，「只有在特殊的環境壓力下，才允許暫短的權宜性的參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註四二）

「考茨基案」，全文譯如下：

無產階級在現行民主制度國家，不能依靠政變獲得政治權力。他們的獲得權力，只有當無產階級政治經濟組織的困難工作，完成到一個相當階段的時候；或者當無產階級體力的和精神的改造有了相當成果的時候；或者當無產階級在國會或各級議會立法機關，獲得更多議席的時候。

政府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無產階級無法一步步獲得政權。如果某一個社會主義者個人成爲內閣閣員，擔任部長，便不能

被視為正常的所謂無產階級獲得政權，那只能視為暫時的代替（temporary makeshift）。

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的這種參加和暫時代替，都不涉及主義原則問題，而且是權宜戰術，對這一點大會不作決定。但這種事例無論如何是一種冒險，只能在經黨全體允許之下，才可實施。社會主義者所任部長職位，被理贖為代表黨執行政策。

任何時地社會主義者閣員獨立於政黨之外，自行其是，他便失去代表黨的資格。他的參與資產階級內閣，便只能被視為削弱而不是增強無產階級力量的手段。那不會使無產階級及早接近獲得政權，相反的，會更為遲延疏遠。

大會也決議，當黨宣佈政府對任何有關資產階級與勞工間的經濟問題，處理顯欠公允，偏袒資產階級時，社會主義者閣員應即辭職。（註四三）

這一議案交大會表決，以二十九票對九票獲大多數通過。第二國際大會，參加者都代表國家，每國家有兩個投票權，所以有的國家可以投相反的兩票。只有比利時和愛爾蘭的代表，投四張反對票。法國、意大利、波蘭、俄國和美國代表，投贊成和反對的各一票。其餘德、奧、英、荷、瑞士、挪威、斯干地那維亞等投贊成票。（註四四）

反對此案者，有意大利代表菲里（Enrico Ferri），法國代表蓋得等。於是菲里與蓋得聯合提出修正案，雖被否決，在第二國際史上也頗有名氣。原案譯文為：

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之第五次大會茲再宣佈，無產階級的獲得政權，不論其手段是出自和平移轉或暴力奪取，都必須包括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

因而，無產階級的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只有是憑藉無產階級自己鬥爭力量，獲取閣員或議員位置，才被允許。社會黨員在資產階級政府內，必須經常保持反對態度。

這一修正案未被通過，不論是考茨基原案或菲里·蓋得修正案，都看不出當時社會民主黨的明確路線，看得到的，只是如何與「資產階級」合作，以爭取選票的修正主義作風。（註四五）

考茨基案首段特別強調「在當前民主制國家內」，「無產階級不能依靠政變（Coup d'etat）獲得政治權力」，否則將

來真正獲得權力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新的野心政治家。所以他諄諄寄望無產階級勞工方面，逐漸在政治、經濟行列中的工作表現，體力和精神的改造提昇，以及在各級議會和立法機構中都有了相當多的席次時，才能談得到政權移轉問題。這看法是以後他和列寧意見分歧的基準點。考茨基認為，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程序問題，一、兩個社會主義者參加政府，固然不是所謂「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少數人用「苦迭打」政變奪得的權力，與無產階級也毫無關係，只會帶來社會新的痛苦而已。這議案看出考茨基後來針對列寧政權，所寫「論無產階級專政」一書的縮影。（註四六）

這一議案的通過，給歐洲許多有志於政府職位的社會主義者找到理論根據。米勒蘭以外，意大利屠拉蒂一九〇三年，畢蘇拉蒂（Leonido Bissolati）一九一一年都參加了內閣，算是社會主義者「執掌政權」。

#### (四) 修正主義之爭與國際社會主義局成立

德國修正主義，逐漸發展自馬克思理論反對派，最初起自南德之撒克遜尼（Saxony）、巴伐利亞（Bavaria）等邦。那兒的工業發展不如普魯士邦迅速，但民主風氣則遠為超過。福爾瑪爾（George von Vollmar 1850—1922）是巴伐利亞邦社會民主黨領袖，最反對的教條是馬克思所說資本與土地將越來越集中少數富人手中的說法。柏恩斯坦對馬克思的修正是全面性的，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代表修正主義的柏恩斯坦，和維護馬克思教條正統的考茨基，展開長期理論鬥爭。一九〇〇年巴黎大會是國際舞臺上鬥爭的開端，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大會，是鬥爭的高潮。這爭論撕斷了兩人間的濃厚友誼。

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展開爭論較早。為此柏恩斯坦於流亡英倫期間，曾於一八九八年致斯圖加特黨全國大會，和一八九九年致漢諾威黨全國大會兩封著名的信，說明他的觀點。一八九八年十月斯圖加特大會，通過決議案反對他的說法，於是他寫出「演進的社會主義」那本書，一八九九年出版，目的在增強他的理論根據。（註四七）

一八九九年漢諾威大會，對柏恩斯坦的信曾展開三天辯論，最後以二八八票對十一票，予以否決。黨大會表決雖然失敗，仍說明他理論影響力之大。他的信分為六個重點：

1. 資本主義制度不是很快就會崩潰的。
2. 「共產黨宣言」內所說社會發展階段，大致是對的，但估計即將到來的新階段大錯特錯。
3. 會會發展並沒有出現「宣言」內所說階級尖銳對立的條件，中產階級數量增加，性質改變，並沒有消失在無產階級行列裏。
4. 生產工業集中於少數大托拉斯之手的說法，無法證實，各種工業是同等速度發展的趨勢。

5. 在工人階級運動壓力之下，反抗資本家剝削的行動已經建立。工廠立法、政府干涉、工時訂定、工會制度等促進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國家政治愈民主，政治災難的機會也愈為減少。

6. 社會成功的最大保障，依賴緩慢堅定的進步，不是依賴災難突變（革命）帶來那點「可能有的」貢獻。（註四八）

德國社會民主黨挾着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兩屆大會的決議，參加一九〇〇年巴黎大會，想對柏恩斯坦理論在國際上的氣焰，加以消殺。

但修正主義是國際上大勢所趨，德國本土青年人尤其為此理論而瘋狂。主要原因是修正主義與歐洲當時的社會化大眾民主運動的成功，暗相契合。巴黎大會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不但有漢諾威大會的支持，而且國會選舉勝利，威震歐洲。事實上與會者對柏恩斯坦修正理論的駁斥甚少，連德國代表也無法在這次大會上對柏恩斯坦提出有力的批駁，大家集中力量在米勒蘭入閣案和反對戰爭、殖民地案上。（註四九）

所以修正主義理論之爭，巴黎大會上倒沒有激烈辯論，有的話只是集中在米勒蘭應否入閣案一個問題上。事實上當時反修正主義者理論並不統一，反米勒蘭入閣態度則頗為一致。經過考茨基的轉圜，反入閣案可說是不了了之，這是以後列寧攻擊考茨基的一大罪狀。

出席這次巴黎大會的，共計七八八人，法國人佔了四七三位。（註五〇）值得注意的是俄國的先期社會主義理論家，已經出場，而且引起極大注意。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葉，俄國和波蘭在沙皇控制下，沒有社會主義的公開組織。但兩國社會主義者的種籽，却

於八十年代逐漸茁壯。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輔、奧得薩（Odessa）等都市，都有流亡海外的社會主義者所指導的秘密組織活動，和宣傳冊子流傳。一八八一到一八八六年間俄國不斷的罷工，高級官吏和沙皇本人的一再被暗殺，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所辦的「鐘聲」（Kolokol），普列漢諾夫（George Valentinvich Plekhanov 1856—1918）所譯的「共產黨宣言」、丹尼爾遜（Nikolai F. Danison 1844—1918）所譯的「資本論」第一卷，都已在國內大量傳播。

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俄國的社會主義者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民粹派土地社會主義」（the agrarian Socialism of the Narodniks），很快孕育出社會革命黨人的胚芽。另一派是馬克思主義派，產生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後一派到一九〇三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Bolshevik）和「孟什維克」（Menshevik）兩派。

出席巴黎大會的俄國代表，包括民粹派和馬克思派兩派。民粹派的領袖是丹尼爾遜和羅甫洛夫（Peter Lavrov 1823—1900），馬克思派的領袖是普列漢諾夫。羅甫洛夫和普列漢諾夫分別以代表身分出席巴黎大會，對考茨基案分別投了贊成票和反對票，普列漢諾夫是反對者。

普列漢諾夫生於俄國小地主家庭，在彼得格勒大學時代，已經是激烈革命派。一八八〇年躲過沙皇逮捕，逃亡西歐，由於他對哲學、常史、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豐富學護，頗受士林敬重。後來「俄國國家出版局」出版他的全集，長達一十四卷。一八八三年九月，他和流亡在日内瓦的阿克雪裏羅得（Pand Borisovich Axelrod 1850—1928）、查蘇里奇（Vera Zasulich 1851—1919），多伊奇（Lev Grigorevich Deutsch 1855—1941）等組成「勞動解放社」（The Liberation of Labour Group），這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以至「俄國共產黨」的前身。至於列寧，一八八三年「勞解社」成立時，他還是個十三歲的中學生，談不到政治問題。一九〇〇年巴黎大會時，他在西伯利亞的五年監禁流放生活剛剛期滿不久，九月初才逃到歐洲，自然無法參加。（註五）

考茨基對柏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思想，在巴黎大會前一直是維護的，一方面基於黨的團結和他與柏恩斯坦的友誼，一方面也因為修正主義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考茨基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斯圖加特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對柏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應採取何種態度問題，提出答覆。因為很多人責備「新時代」主編（即考茨基）長期連載柏恩斯坦修正主義的文章，却不如按語闡駁。考茨基說：「柏恩斯坦沒有使我們喪失信心，而是使我們思考。為這一點我們應該感謝他。」（註五二）

普列漢諾夫爲了反駁考茨基的說法，同時也爲了反對柏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在一八九八年「新時代」第二五三至二五五期上，刊登一封致考茨基的公開信，他說：

您在斯圖加特大會上說：「大家責備柏恩斯坦，說他的文章減弱了我們對勝利的信念，束縛了鬥爭的無產階級的雙手，我不同意這一見解。」

柏恩斯坦使那些人喪失信心呢？顯然，是那些贊成柏恩斯坦新觀點的人。只要接受這一觀點，就必然使任何一個具有邏輯思想的人，與舊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完全決裂。

最主要的是，在和柏恩斯坦爭論的時候，必須記住李卜克內西的話：「如果柏恩斯坦是對的，我們就只有把我們的綱領和自己整個的過去都埋葬掉。」我們必須堅持這點並向我們的讀者解釋，今天的問題就是誰埋葬誰的問題：是柏恩斯坦埋葬社會民主黨，還是社會民主黨埋葬柏恩斯坦？（註五三）

在巴黎大會上，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對柏恩斯坦的修正主義觀點，並無若何改變。只不過反戰案和米勒蘭入閣案的重要性，掩蓋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所以未見熱烈爭論。

普列漢諾是第二國際從一八八九年巴黎大會創建以來，每屆都參加的俄國代表之一。儘管他是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馬克思「工人無祖國」理論無條件赤誠擁戴，但在實際事例中對待波蘭代表的態度上，却顯出大國沙文主義的帝國主義面孔。出席國際會議的波蘭最著名人物，是羅莎·盧森堡。

波蘭由俄、普、奧三國瓜分統治，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已一百二十餘年。一八三〇年、一八六三年俄國統治區之波人抗暴要求獨立，俄人鎮壓，極爲殘酷。事後規定俄區波蘭人只准使用俄文俄語。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後，德國統一，規定德國佔領區內波人亦只准使用德文德語。波蘭之亡國心態，悲哀可知。七十、八十年代，各國佔領區波人均有社會黨之類似組織，共同要

求都是謀求波蘭復國與獨立，以俄國佔領區黨的組織最為堅強。

一八七八年波蘭社會主義者在波蘭本土俄統治區初現端倪，一八八二年建立組織，被沙俄破獲，首腦四人全被絞殺。一八九一年由流亡巴黎之知識分子建立「波蘭社會黨」（ Polish Socialist Party-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 P.P.S. ），領導人是皮爾蘇斯基（ Josef Pilsudski 1867—1935 ）。他的目標單純，就是聯合俄、德、奧統治區波蘭人革命復國，建立「統一的、民主的、共和的社會主義波蘭」。（註五四）

一八九一年另一羣以青年學生爲主的波蘭人，也在巴黎成立一個組織，名爲「波蘭社會主義者海外協會」（ Association of Polish Socialists Aboard ）。這一組織也是反對沙皇的，但並不贊成皮爾蘇斯基的狹隘復國主義。這些人以爲，波蘭的社會主義者，必須聯合俄國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共同推翻沙皇，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波蘭自然可以和俄國平起平坐，「在民主共和的俄國聯邦內，建立波蘭自治國。」這一組織初成立時是皮爾蘇斯基「波蘭社會黨」內的一派，一八九五年終於分家，建立「俄波社會民主黨」（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 Russian Poland ），領導人是盧森堡和喬基奇（ Leo Jogiches 1861—1919 ）。

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生爲猶太裔波蘭人，出生地在舊俄波交界處之 Zamosc ，波蘭猶太人是俄國少數民族中最受壓迫者。爲了受較好教育，她的父親在她三歲時，舉家遷居華沙。由於俄國禁止使用波語波文，高中時便在學校參加反抗沙皇組織，她逃過追捕，一八八九年流亡瑞士入蘇黎世（ Zurich ）大學。初習哲學、數學，後改政治經濟。在蘇黎世結識俄國社會主義者查蘇里奇、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以及一生影響她最大的猶太裔波蘭人喬基奇。（註五五）

一八九三年第二國際蘇黎世第三次大會，盧森堡組成十人代表團希望代表波蘭參加。團員多是無名氣的學生，「資格審查會」不知道他們該代表那一個國家。比利時勞工黨（ Bilgian Labour Party ）領袖樊廸文（ Emile Vandervelde 1866—1938 ）在三十二年後回憶說：「當時年僅二十三歲的羅莎，甚少人知，反對她的代表團參加的人多，情形十分困難。但羅莎一下跳上座椅，短小嬌美的少女，穿着一件褪色的夏衣，用清晰的演講爭取代表權，她被大會鼓掌通過。」（註五六）

她被通過了，波蘭的其他代表却通不過。因爲「資審會」名單內有最重要的兩個人普列漢諾夫和恩格斯作梗，全是反對波

蘭代表最力的。普列漢諾夫和喬基奇是死對頭，喬基奇的民粹派大力反對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解放社」，恩格斯則反對波蘭代表團的「復國論」，因為「工人無祖國」，不論以任何理由要「復國」，都為恩格斯所不喜。（註五七）

一八九六年倫敦大會，波蘭代表同樣被留難，盧森堡仍被特例通過。一九〇〇年大會要再度否決波蘭代表的資格，因為俄、德、奧三國代表掌握了大會的部份形勢，三強之下，亡國的波蘭人能代表誰？但盧森堡不只是波茲南（Poznan 當時名Posen）選出的正式代表，而且是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華沙，以及由二十八名波蘭知名人共同簽署推薦的代表。她的資格，又被通過。（註五八）

巴黎大會上，盧森堡是反戰爭、反殖民、反軍國主義案的主要提案人，她對於考茨基的解決米勒蘭入閣案，也極為不滿。在一片附和聲中，她持異議說：「得累斯登大會（Dresden Congress）不同意米勒蘭入閣案的決議，不該視為一張廢紙。除去說戰術的權宜需要外，還會幹什麼？」（註五九）

巴黎大會另一項決議，便是決議設立「國際社會主義國際局（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這一組織在一八九年倫敦第四次大會時，同意設立委員會調查是否有建立「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ssion）的必要，這次大會正式提出決議，要求會後成立，並要求設置「有給職國際書記長」（Paid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這議案由德國代表提出，設立之目的為「供應有關國際之訊息、圖書、檔案資料，出版印刷品刊載國際重要文獻，在各國推展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對各地無產階級之組織活動，給予必要支援。」（註六〇）

國際社會主義局後來設於布魯塞爾，因為它是「中立國的首都」，富有「國際性」。奧國社會主義者西爾文（Victor Serwy）被選為第一任「書記長」，任職至一九〇五年。第二任「書記長」為胡斯曼（Camille Hnysmans），任職至第一國際結束。國際局設主席一人，由比利時勞工黨領袖樊迪文擔任，直至大戰爆發，國際結束。主席之下設兩個委員會，一為「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由當時之二十五個國家有社會主義黨或組織者，派遣代表組成。另一為「國際社會委員會」（Inter-Parliamentary Commission），專職連絡各國國會間之社會民主黨或勞工黨團活動。（註六一）

國際巴黎大會，時序已至二十世紀，普列漢諾夫在歐西已經流亡二十年，被公認為馬克思主義傑出學者。盧森堡已在歐西

活躍十一年，被公認是辭鋒最健的理論家。列寧年三十，剛剛於一月底從西伯利亞五年流放生活中獲釋，七月中秘密啓程赴瑞士，八月初抵蘇黎世。受到普列漢諾夫的照料，準備合辦「火星報」。他自然沒有參加巴黎大會，四年以後的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國際第六次大會，列寧第一次參加。

但列寧是第二國際最激烈的詆譏者，他的大批著作裏，詆譏第二國際的文章和演講，構成文獻的主要部份之一。下一次大會，已經可看見列寧的激烈表演，所有本文中提到的人名，幾乎都成列寧反對和譏罵的對象。第二國之社會主義國際局是國際創立十一年後的一個組織，本來有名無實，難生作用，以後也受到列寧最惡毒的攻擊。他說國際局是機會主義者、無產階級叛徒、投降調和派等等的集合體，甚而說是沙皇的御用機構等等。例如他的「歐洲大戰前國際社會主義國際局與沙皇政府」（一九〇五、六、二一）「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局的俄國會主義工黨代表・致俄國社會主義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一九〇五、一〇、二一），以及「國際社會主義局在戰爭時期的作用」（一九一六、二、三），本文不另贅述。（註六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清明節

完稿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 附 記

有關第二國際問題，可參閱拙作「第二國際前期研究」（黎明公司出版）、「九十年代初期第二國際兩次大會」、「第二國際倫敦大會以後」、「費邊社會主義與第二國際」等（以上各文見「復興論文集」七二、七三、七四年號）。

### 註 雜

②Ibid., XI  
③Peter 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4-5.

(3)雷岱爾著，鄭學稼譯，社會主義思想史（臺北・帕米爾書店，民國六十一年），頁四二二。

### 註 四

Bernstein, "Introduction", op cit., X.

### 註 五

Peter Gay, op cit., pp. 73, 74.

### 註 六

Ibid., P. 77.

### 註 七

愛爾弗特大會，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九一年舉行於德國西南部之小城 Erfurt。該次大會上通過由考茨基、柏恩斯坦合擬之社會民主黨綱領，是為「愛爾弗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它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國的和歐洲的社會主義黨綱領，對第一次大戰前後之奧馬學派（Austro-Marxismus）和現代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影響均大。

### 註 八

註八•Peter Gay, op. cit., pp. 77, 78.

註九•Ibid., pp. 83-85, 90-92. 按杜林生於柏林，在柏林大學初修法律經濟，繼修哲學，獲博士學位。一八六四年起任柏林大學講師（Privatdozent），主授哲學與經濟，至一八七七年被解職，曾引起社會主義者及學生示威抗議，學校不理。他自三十歲起成爲盲人，却能著書教學，在十九世紀六十、七十年代，舊聲士林，亦大奇人。他主張激進社會主義（Radically Socialist tone）。

註一〇•Ibid., pp. 88-89. 依皮特·根考證，柏恩斯坦會拜訪杜林一次，因爲杜氏的反猶態度，不再交往。

註一一•Ibid., P. 93.

註一二•Bernstein, op. cit., pp. 6-7.

註一三•Ibid., pp. 8-9.

註一四•Ibid., pp. 30-33, 31, 39.

註一五•Ibid., pp. 46, 51-52, 60-61.

註一六•Ibid., pp. 102-103.

註一七•op. cit., Bernstein, pp. 200-201. 柏恩斯坦述說此一典故... Cant 一字源自英國，十五世界清教徒用此字以形容其聖歌神聖性。其後轉義爲一切言談行爲及政治宗教等之缺乏真實，以教條目的代替真實狀況者。

註一八•Ibid., pp. 203, 205-207.

註一九•Ibid., P. 222.

註二〇•Werner Sombart, *Socialism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London: J. M. Dent & Co. 1909). P. 193.

註二一•Ibid., P. 195.

註二二•Ibid., pp. 195-196. 按饒勒斯爲法國社會民主黨建立時期主要領袖之一，一八九二年正式參加黨，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他是 Toulouse 大學教授，近二十年的國會議員，大戰起時他仍主張聯合英國迫使德國讓步，和平解決戰端，終遭刺死。

註二三•Leszek Koł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115-117, 139.

註二四•Sombart, op. cit., P. 196.

註二五•James,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New York: Preager 1956) pp. 109-110.

註二六•參閱

③Cole, op. cit., P. 43.

◎Paul Frolich, *Rosa Luxemburg*, translated by Joanna Hoornweg (London: Pluto Press, 1972) pp. 156-158.

註二七•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頁四八七。

註二八•譚譯自 Sombart, op. cit., P. 201.

註二九•Ibid., pp. 201-204.

註三〇•Ibid., P. 44.

註三一•Cole, op. cit., P. 44.

註三二•兩案經過情形參閱拙作「修正主義的萌芽期——第二國際倫敦大會以後」，載「復興論文集」，第六期（民國七十三年六月）。

註三三•米勒蘭（Alexander Millerand 1859-1943），一八八五年參加法國社會主義陣營，並成爲左派領袖人物，一八九九年六月應盧索（Waldeck Rousseau）內閣之邀，出任工商部長至一九〇一年，引起馬克思派之極大不滿。其後於一九〇九年任公共事務部長，一九一四年任戰爭部長，一九二〇年被選爲總統。

註三四•Gray P. Steenson, *Karl Kautsky 1854-1938*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8) pp. 114-115.

註三五•Ibid., P. 115.

註三六•「時代週刊」（Die Neue Zeit），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考茨基一八八〇年創刊於倫敦，一八八三年遷斯圖加特，一八八六年遷柏林，由週刊改爲月刊。考茨基主編此刊物直至一九一七年，對馬克思學說之宏揚傳播，貢獻至大。

註三七•Steenson, Karl Kautsky, op. cit., pp. 83-93.

註三八•Julius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 I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271.

註三九•Ibid., P. 271. 指伊夫里指 Ivry-Sur-Seine，在法國北鎊，巴黎之東南方，瀕塞納河畔，當時約有人口四萬四千。法國蓋得派（Guesdists），爲法國之馬克思派領袖蓋得（Jules Guesde 1845-1922）。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他是社會主義者激烈派，被判刑五年，逃亡瑞士至一八七六年始返國。次年

辦平等週刊（*Egalite*），宣揚馬克思學說，一八七九年仿照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召開馬賽大會（*Marseille Congress*），建立法國社會民主黨。會後與馬克思之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同赴倫敦，請馬克思指導法國社會民主黨編草案。

註四一・*Ibid.*, P. 27.

註四二・*Ibid.*, P. 272.

註四三・Sombart, op. cit., pp. 220-221.

註四四・數字有出入。參閱 Cole, P. 40, Sombart, P. 221.

註四五・Cole, op. cit., pp. 40-41.

註四六・Braunthal, op. cit., P. 273.

註四七・Harry W. Laidler,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 1927) pp. 295-296.

註四八・*Ibid.*, pp. 296-297.

註四九・James Joll, op. cit., P. 94.

註五〇・Sombart, op. cit., P. 188.

註五一・Braunthal, op. cit., pp. 229-230.

註五二・普列漢諾夫著，「我們為什麼應該感謝他——給考茨基的一封公開信」，普列漢諾夫著，劉若水譯，反對哲學中的修正主義（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頁二四。

註五三・同上書，頁三六至三八。

註五四・Braunthal, op. cit., P. 231. 按皮爾蘇斯基生於俄屬波蘭區，幼受俄國教育，一八八七年反俄被放逐西伯利亞五年，日俄戰後在奧國建抗俄軍，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俄波之戰，率軍大敗俄人，戰後出任波蘭第一任總統及波蘭統治者至一九三五年五月逝世。

註五五・Frolich, op. cit., pp. 11-12. 按一般書述盧森堡生史，其出生年均為一八七〇年，Frolich 考證依蘇黎世大學學生註冊資料，改為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生，本文依此。喬基奇身世如謠，亦猶太人，生於立陶宛之首都 Vilna。他是盧森堡的同志和丈夫，一八八五年建立第一個「崩得」(Bund)於 Vilna，參加者有皮爾蘇斯基和被沙皇綏死的列寧哥哥。「崩得」為以後俄國之猶太人革命組織，影響甚大。他也是民粹派主要成員，那是普列漢諾夫最反對的。盧森堡一九一九年三月被德國軍人殺死不久，喬基奇亦被殺。

註五六・*Ibid.*, P. 34.

註五七・*Ibid.*, P. 35.

註五八・Sombart, P. 222.

註五九・*Ibid.*, pp. 222-223.

註六〇・*Ibid.*, P. 190.

註六一・參閱 Braunthal, pp. 243-244. Cole, P. 44-45.

註六二・以上各文散見中共出版之「列寧戰爭論」（一九四九年版），「列寧文集」第二冊、第四冊（一九五四年版）等。